

# 中世紀中国と日本の文化に関する二つの史書の比較研究

周 懷宇<sup>1</sup> 遠藤 隆俊<sup>2</sup>

(<sup>1</sup> 安徽大学歴史系・<sup>2</sup> 高知大学教育学部)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Middle Ages of China and Japan

Zhou Huaiyu<sup>1</sup>, Endo Takatoshi<sup>2</sup>

<sup>1</sup> Faculty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sup>2</sup> Faculty of Education, Ko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Two Japanese monks, Yuankai and Yuanren, wro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Buddhism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former wrote "Tang Da He Shang Dong Zheng Chuan", which describes the life of Jian Zhen who went over from China to Japan. The latter wrote "Ru Tang Jiu Fa Xun Li Fa Ji", which describes his stay in Tang China as a student.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medieval China and Japan focusing these two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キーワード：元開『唐大和上東征伝』，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記』，唐代中日交流

keywords : Yuankai, "Tang Da He Shang Dong Zheng Chuan"

Yuanren, "Ru Tang Jiu Fa Xun Li Fa Ji"

Tang dynasty, cultural exchange, China, Japan

## 前 言

本稿は安徽大学の周懷宇氏が「中国四国歴史学地理学協会高知大会」(平成18年6月3～4日、高知大学)に寄せた文章を骨子としており、それはまた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費特定領域研究「東アジアの海域交流と日本伝統文化の形成」日記班(代表:遠藤隆俊、高知大学)において行った共同研究の成果でもある。内容は唐代の日中交流に関する論考で、遠藤が資料および情報を提供し、周氏が内容の骨子と文章を構想した。周懷宇氏は1947年、安徽省の生まれで、現在は安徽大学歴史系の教授である。専門は中国の唐代史で、主に隋唐五代の文献学や社会経済史を研究している。

さて、本稿で用いた二つの史料、すなわち元開『唐大和上東征伝』と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はともに日本では既に知られた史書であり、中国においても近年注目されている。前者は鑑真の渡来に関する伝記であり、後者は円仁の入唐に関する日記である。この二つの史書に関する研究は日中ともに数多くあるが、本論ではこれを中国史とりわけ文献史料学の立場から比較検討した。具体的にはこの二つの史書の形式や体裁、内容、そしてその書かれた史料的价值について考察している。

まず形式および体裁については、紀伝体および編年体という中国における伝統的な歴史書の形態から上記の両書と比較した。次に史料の内容に関しては、それが書かれた時代背景および作者をとりまく状況について、東アジア交流史の視点から考察している。さらに、これら二つの史書に載せられた史料の価値、とりわけ社会文化史的史料の価値を、文献史料学の視点から整理した。中でも『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には「会昌の廃仏」と呼ばれる唐代武宗期における仏教弾圧の具体的な様子や詔勅、公文書類が詳細に書き残されており、本論ではこれらを初歩的な整理としてまとめておいた。ほかに両史書に共通する話題には揚州龍雲寺の火災や新羅僧の入唐などがあり、当時一般の史料では知り得ない地域情報や東アジア情勢に関わる重要な問題である。

本論ではこれまでの研究を逐一引用してはいないが、日本における古典的な研究訳注として、例えば足立喜六訳注、塩入良道補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記』(平凡社東洋文庫、1970、85年)がある。ここに記された解説および研究と本論との間には、互いに共通する論点が少なくない。その意味で、今後はこうした情報交換を一層進めることにより、研究のさらなる深化と発展が期待される。また、本論のように上記二つの史書を中国文献学の観点から比較検討した研究はこれまでになく、その点において本論の研究史的意義は大きいと言える。

日本僧の旅行日記としては、ほかに本論でも紹介した通り円珍『行歴抄』、成尋『参天台五臺山記』などがある。今後はこれらの日記史料を比較検討することにより、唐宋時代における日記の変遷ならびにその特徴について考察を進めたい。以下、周氏の構想した文章とその摘要を掲載する。大方のご批判を仰ぐ次第である。

### 中世纪中日两部文化史的比较研究

唐代日本僧人元开、圆仁分别撰写了两部佛教文化方面的史著，一为《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两部著作在新、旧唐书《艺文志》和《经籍志》都未著录，但是其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均有一定的意义，堪称域外文化史的双璧，凡治唐史和中外文化史者都不能忽视。这两部文化史，体例不同，记载的内容不同，分别记载中日两各国家历史人物，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却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作者都是日本史学家，都是用汉文撰写的汉籍，都是当代人撰写当代的历史，都是记载中日文化交流的题材。《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今天，从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角度，比较这两部文化史，对于加深认识这两部史学著作的史学价值，揭示作者客观记载中日关系、讴歌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学思想，进一步总结中国史学史不无裨益。本文试从编纂体例、史学思想、内容与社会背景三个方面进行总结比较。

#### 一、两部主题相同体例不同的文化史

《唐大和上东征传》1卷，约万言，以下简称《东征传》。作者日本真人元开，又名淡海三船。真人，是日本古代官名，相当于唐朝的尚书。元开是日本奈良年间（710—794）著名的学者，天智天皇的后代，池边王之子。生于日本元正天皇养老六年（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死于桓武天皇延历四年（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终年63岁。元开早年出家为僧，法号元开。他三十岁时，还俗入仕。其学术造诣主要在史学、文学、佛学方面。日本天平宝字年间（751—764）到天应元年（781）之间，元开在日本已经颇具声望，被视为学界的领袖。唐朝鉴真法师东渡日本平城奈良之后，元开面谒鉴真，亲受鉴教诲导引。鉴真圆寂于日本不久，元开58岁时，撰写了这部《东征传》，用传记体记载了鉴真东渡日本的曲折经历及其不平凡的一生。

《东征传》的传主鉴真法师是唐朝佛学大德，主治律宗，在禅林中十分有影响。他东渡日本之前，已经引度四万余僧众（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载《大藏经》第51册）。

东渡日本，弘扬佛法，历经曲折，传播中国文化。《东征传》依托这一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演绎中日文化交流史，无论在史学思想和方法上，都显示了作者的历史眼光和学术地位。

据汪向荣等学者研究考证，鉴真的学生思讷曾经撰写《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以下简称《大和上传》。可惜思讷撰写的《大和上传》已经亡佚无存，但是其精华已经被日本学者元开所吸收。依据汪向荣考证，《大和上传》记载的内容，几乎全部保留在《东征传》中。

《东征传》成书后，其版本主要在日本流传，大约宋代传入中国。宋代赞宁编修的《宋高僧传》著录了《唐大和上东征传》这本书。书中卷一四《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结尾记载说“僧思讷著《东征传》详述焉。”可以见证赞宁见到了《东征传》，只是赞宁误认作者为思讷。这也证明《东征传》在宋代已经流传到中国。从此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4卷，约8万5千字。以下简称《入唐记》。作者日本著名高僧圆

仁(794~864),俗姓壬生氏,日本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生于下野(今栃木县)都贺郡,幼年丧父,性聪颖,年九岁,其兄授以经史。都贺郡小野寺村有大慈寺,寺庙住持广智,是鉴真法师的三传弟子(鉴真有弟子道忠,传法弟子广智)。广智收圆仁为法嗣弟子,专修内典。圆仁年十五,登京都比睿山谒传教大师最澄,投其门下,受密教法。天台宗自延历二十五年(806)得到日本朝廷的重视,圆仁于弘仁四年(813)被朝廷批准“得度”,即是国家造册登记的僧人。弘仁七年(816)正式受戒,在比睿山大乘戒坛任教师。圆仁曾经先后在法隆寺、四天王寺等讲授法华经、仁王经。日本仁明帝承和二年(835),圆仁受命入唐求法。圆仁经过准备,于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六月,随日本第十八次遣唐使藤原常嗣西渡入唐,时年45岁。

圆仁游唐十年,其《入唐记》就是游唐十年期间撰写的日记,后来修成编年体史书。主要内容记载了圆仁师徒一行入唐前后寻师求法、学习佛法的主要经历,同时记载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历史及其国情。学界高度肯定这部著作说:“身渡沧溟,足踏灵窟。赶上智而餐其说,何硕学而穷其源。三密甚深之法,分泾渭以实传;一乘圆通之教,振膏肓而无疑。”

圆仁回国,受到文德、清和等帝的宠遇。嘉祥元年(848)授传灯大师,时年55岁。仁寿四年(854)任天台座主。圆仁一生著述甚丰,据赤堀(ku,泛指洞穴)氏所辑《日本文学者年表》,圆仁著有经疏、私记凡94种,152卷。贞观六年(唐懿宗咸通五年,864)正月十四日,圆仁寂于京都延历寺,年71岁。圆仁一生最大的贡献是继承最澄法师的遗志,隆兴来自中国的天台宗。日皇赠圆仁谥号:“法印大和上,仍赐号慈觉大师。”

圆仁《入唐记》,原是日记,后改写为编年体成书,可以举出书中记载的内容为证:“廿一日,敬文又亦来,笔言通情。已后相续来语话。”文中提到的敬文,是天台山寺庙的和尚,当日来访圆仁,相互以笔代言。“已后相续来语话”,显然不当天的日记,而是后来编修时补记。这样例证很多,不用赘述。

圆仁撰写的编年体《入唐记》,深得中国传统史法之妙。在编年体中有补叙、插叙、追叙,比较出色地完成了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任务。其中不乏对于典型历史人物的记载,圆仁师徒、日本出使唐朝的官员、唐代淮南道节度使李德裕等地方官、唐朝著名寺庙的大德、名僧等等都有详细记载,增加了史书人本特色。

元开撰写的《东征传》,虽然是人物传记体,其记载人物行事活动暗合历史编年顺序,行文脉理清楚,深得中国史学传记体之法。两部史书都是从日本学者的视野撰写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史书完成于作者当代,实际上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作者又有很高的学术素养,所以两书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学术价值。两书记载的内容前后相继,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中,书中记载的内容属于唐玄宗(712-755)到唐武宗(841-846)时期的历史,中间历经肃、代、德、顺、宪、穆、敬、文十代皇帝。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政策剧变的时期,由崇佛、尊佛转向毁寺、废佛。面对着中国佛教的变化,除了中国佛门中的僧尼受到冲击,留学、访问中国的各国学僧尼经历怎样的命运?尤其是日本入唐僧侣众多,也直接受到这一文化政策的影响,如何分析这一时期这一文化现象,这两部史书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两书的作者均是日本名望很高的学者，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其撰述的体例虽然有传记于编年之别，其学术造诣都很高，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领域里内在矛盾揭示很深，有异曲同工之效。

## 二、两支苦心孤诣不同凡响的文化苦旅

《东征传》《入唐记》这两部文化史，分别记载了八至九世纪中日两国的两个僧侣团体，为弘扬佛法、传播文化的艰辛活动。两部史书记载的两支文化苦旅，不仅事业高尚，而且事迹感人。许多地方如出一辙，如同在不同的时空中共同演绎了一曲震响海天的凯歌。以唐朝鉴真法师为首的师徒及其僧众，不畏艰险东渡日本传法；以日本圆仁法师为首的师徒及其僧众，不畏艰险西行唐代中国求法。这两支文化苦旅，均属于自发献身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尚事业。两名日本史学家编修的这两部文化史，属于日本史学中早期的著作，不仅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揭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也留下了中国史学对于日本史学深刻影响的见证。

### 1、都经历了出航的千难万险。

《东征传》中，记载了鉴真 6 次东渡，5 次受挫，最后一次才经历了几乎同样的曲折而成功。

《入唐记》记载了圆仁 3 次西渡入唐，经历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各种考验才实现了入唐的目的。

### 2、他们都付出了牺牲。

鉴真的日本弟子荣叡和自己的爱徒祥彦都死于东渡传法途中。鉴真在日本传法 10 年，最后也圆寂于日本。遗骨与日本的青山共存。书中记载他们不畏死难追求信念，从容赴死的精神，读了令人久久不能够平静。例如鉴真法师从东渡受挫，从广州起帆返回扬州的途中，其弟子祥彦病死吉州，临死前，“祥彦于舟上端坐，问思讷师云：‘大和上（对于鉴真的尊称）睡觉否？’思讷答曰：‘睡未起。’彦云：‘今欲死别。’思讷咨和上，和上烧香，将曲几来，使彦凭几向西方念阿弥陀佛。彦即一声唱佛，端坐，寂然无言。和上乃唤：‘彦！彦！’悲恸无数。”这一段记载如同海上冰山，表面上平静，内心如同水面下的潜流在涌动，无比震撼人心。圆仁的学生惟晓也在归国之前死于别离五台山的途中。“惟晓身亡，并无钱买地。伏乞三纲和尚慈悲，赐与一墓地埋殓。”这位为了文化交流而殉身的日本僧人遗骨留在中国。

### 3、他们的文化活动都不限于佛教。

以鉴真为例，鉴真抵达日本，在日本传法 10 年之久。他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所作的主要贡献有：宣讲律宗、天台宗的经典；创建律宗总本寺——唐招提寺。该寺显示了唐代中国建筑艺术的杰出成就；鉴真的学生在唐招提寺内中用夹纻法制成鉴真像，促进了日本雕塑艺术的发展；在书法、刺绣、药物等方面也有广泛深刻的交流。鉴真东渡日本的随行人员有“玉作人、画师、雕檀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都有八十五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

这些都是各个方面的知识性和技术性人员，还有建筑方面的人员。鉴真本人也精于建筑设

计。这些必然对于日本相关的文化产生重要的乃至深远的影响。其四，这两部著作都是日本学者用汉文撰写的文本，留下了域外的仅有的少数汉籍文献。史料价值珍贵。

《入唐记》记载了圆仁留唐近十年，广泛寻师求法，曾到五台山巡礼，足迹遍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诸省，并留居长安近五年。他学习汉文，并且用汉文写下了日记，修订成文化史《入唐记》，记载范围涉及唐王朝皇室、宦官和士大夫之间的政治矛盾，他与李德裕、仇士良的会见，社会生活各方面如节日、祭祀、饮食、禁忌等习俗，所经过的地方的口、出产、物价，水陆交通的路线和驿馆，新罗商人在沿海的活动和新罗人聚居的情况等等。关于唐代南北佛教寺院中的各种仪式等，圆仁更有详细记载。他在唐时正值武宗废佛（见会昌废佛），关于 845 年（唐会昌五年）正式下诏废佛之前对佛教徒的种种措施以及朝廷大臣、宦官对废佛的不同态度，不同年龄的僧尼和外国僧人所受的不同待遇等等，在其书中都留下了客观的第一手资料。

日本仁明天皇承和元年（唐文宗太和八年，834）任命参议藤原常嗣为遣唐大使。次年七月，藤原常嗣领队，四舶同发。圆仁以入唐请益僧身份从行，但因出海后即遇到风险，舟破折回待命。四年七月船舶修缮竣事，重新起航西行，不料又遭逆风，航行未果。五年（838）六月十三日，一行又由九州博多第三次启航入唐，圆仁《入唐求法巡礼入唐记》即以这一天开篇。

遣唐使舶于六月二十二日放洋，途中遇涛甚烈，一行饱历艰险。第三舶在途中遭难沉没，140 多人遇难。其余三舶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七月初二日，即出洋后十日，抵达唐朝淮南道扬州府海陵县。当时淮南道节度使李德裕报告朝廷，朝廷批准大使等少数人入长安，其余随行人员原地待命。圆仁请求巡礼天台，留在扬州等待“敕许”。圆仁待命期间，向宗睿学县（tán，梵语，意为佛法），求得胎藏金刚两部曼荼罗，诸尊坛样，高僧真影及舍利二十一种，经论章疏等一百二十八部一百九十八卷。既而，迎大使于楚州（今江苏淮安）。圆仁请求巡礼天台之事没有批准，懊丧登使舶回航。回航时期，舟泊海州东海县，偕弟子从僧惟正、惟晓，水夫丁雄万托词潜行登陆，为海州官府察觉，受刺史点检；适遣唐使第二舶驶至海州沿岸，乃复被护送登舟。开成四年四月十八日，舟行抵达山东登州牟平县海岸。《入唐记》第一卷记事止于此。这一段故事记载了唐朝海关对于入关的各种活动的管理。

开成四年六月初七日，舟泊登州文登县赤山浦。赤山浦有新罗人张宝高建置的法华院，有僧侣三十多人，其中日僧占七成。圆仁很想留下来，就与大使告别，弃舟登陆，直接投奔赤山浦法华院。圆仁留法华院一年多，和平卢节度使兼登州诸军事押衙张咏联系，张咏曾经游日本，为圆仁活动，得到朝廷的同意，敕许圆仁巡礼五台。开成五年四月，圆仁由赤山浦至登州北上，经青州（益都）、淄州（山东淄川）、齐州（山东历城）、德州、贝州（河北清河）、冀州、赵州、行唐，由此西北向太行山；五月十六日，抵清凉山。《入唐记》记载了这一段历史：“岭上谷里，树木端长，无一曲戾之木。入大圣境地之时，见极贱之人，亦不敢作轻蔑之心。若逢驴畜，亦起疑心，恐是文殊化现。举目所见，皆起文殊所化之想。圣灵之地，使人自然对境起崇重之心也。”《入唐记》第二卷止于此。

圆仁于四月十八日望见中台，即伏地遥礼，不觉泪流；乃复跋涉西北东各台，遍寻灵迹；参谒玄鉴、志远等名师，递呈所带来的延历寺疑义三十条，请求解疑解惑，抄录天台秘笈，得书三十四部三十七卷。留山中达五十余日。七月初一，乃擷灵石及狮子脚迹土以为纪念；拜别灵山，西向长安。途经忻州（山东忻县）、太原、河中府（绛州），由龙门渡黄河，复穿朝邑、栌州。于开成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始抵达其梦魂萦绕的大唐首都长安。到达后，请命于左街功德使仇士良，安排居住资圣寺。长安名僧如林联镰兢秀。圆仁即留居，向大兴善寺元政和尚和青龙寺义真和上学习西部秘法；向青龙寺法润和上学习金刚戒。向玄法寺法全和上学习胎藏仪轨。武宗会昌元年（841）八月，圆仁留唐已经三载，学习佛法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乃上书功德使，请求回国，没有批准。武宗即位以来，打击佛教。会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牒传全国各寺庙，查禁外国僧侣，圆仁具牒说明情况。《入唐记》第三卷止于此。

第四卷所记乃是圆仁在会昌排佛时的一段历史。会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圆仁弟子惟晓痼疾七个月病死，圆仁为惟晓筹办殡葬，不免有些感伤，唐朝正在排佛灭佛，难以继续留在唐朝深造，于是决定回国。唐武宗毁寺驱僧，会昌五年达到高潮。圆仁也接到命令还俗，得以回国的机会。五月十五日从长安出发，行前，信士杨敬之、李元佐等为之饯行惜别。曰：“我国教法，随和上东矣。”圆仁蓄发易装，经郑州、汴州（河南祥符）、泗州（安徽盱眙）而下维扬，复出楚州、海州，穿密州（山东诸城）、莱州（山东掖县）而抵文登之新罗所，等待便船回国。受到节度使张咏的爱助庇护，一直等待三年。宣宗大中元年（日本仁明天皇承和十四年，847）九月，才得到机会搭乘新罗人金珍之商船东归。这时，圆仁净发、易缁衣，从赤山浦出发，九月十七日抵达筑前之博多。太宰府驿报中枢，太政官得讯，即檄文太宰府迎接圆仁入京。圆仁乃献帛币于太山寺住吉大神、香椎名神等，答谢天庥。全书终止。

《入唐记》承和五年（838）六月十三日开始编修，承和十四年（847）十二月十四日，凡历九年七月。圆仁在唐朝的行踪，就今天的行政区划而言，有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七省。《东征传》不是简单的人物传记，传主鉴真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记载鉴真飘洋过海传承佛法的历险活动，贮存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丰富历史信息。作者通过一系列历史事实予以记载。

### 三、附载两国社会历史的密集信息

这两部文化史在记载两支文化苦旅艰辛活动的同时，也拓宽范围，记载了两国社会发展、政治、经济、军事、风俗民情等等丰富的内容。不仅对于加深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化活动提供了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为其它各个方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圆仁留唐近十年，他广泛寻师求法，曾到五台山巡礼，足迹遍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诸省，并留居长安近五年。他学习汉文，并且用汉文写下了日记，后来修订成文化史《入唐记》，是研究唐代历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圆仁的记述涉及唐王朝皇室、宦官和士大夫之间的政治矛盾，他与李德裕、仇士良的会见，社会生活各方面如节日、祭祀、饮食、禁忌等习俗，所经过的地方的人口、出产、物价，水陆交通的路线

和驿馆，新罗商人在沿海的活动和新罗人聚居的情况等等。关于唐代南北佛教寺院中的各种仪式等，圆仁更有详细记载。他在唐时正值武宗废佛（见会昌废佛），关于 845 年（唐会昌五年）正式下诏废佛之前对佛教徒的种种措施以及朝廷大臣、宦官对废佛的不同态度，不同年龄的僧尼和外国僧人所受的不同待遇等等，在其书中都留下了客观的第一手资料。

《东征传》记载了扬州龙云寺失火的事情，后来《入唐记》也记载了扬州龙云寺失火的事情，说明记载的内容属实可靠。认真阅读这两部史著，可以获得丰富的历史信息。例如《东征传》记载唐代鉴真法师六次东渡日本的不平凡经历，他和他的弟子东渡日本所携带的文献、物品以及各个方面的知识性人才、技术性人才等等，对于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访日途中经历的中国国内交通及海上航行情况、沿途所经历的两国各地的城邑、佛寺，沿途所见所闻两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民情风俗等等，都是宝贵的史料。同样《入唐记》记载日本圆仁和尚一行西行抵达唐代的中国，苦心孤诣学习汉文、梵文，研究中国的佛学，走遍大半个中国，留唐十余年，亲历了唐代中国文化史的变迁，编修了这一宝贵的历史文献，成为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见证。

经济上，记载了两国货币交换和物价比值。如“十四日，砂金大二两于市头，令交易。市头秤定一大两七钱，七钱准当大二分半，价九贯四百文。更买白绢二疋，价二贯，令作七条，五条二袈裟。亦令僧贞顺勾当此事。”又“十一月二日，……有敕断铜，不许天下卖买。说六年一度例而有之，恐天下百姓一向作铜器，无铜铸钱，所以禁断矣。”又记载了市场禁止买卖铁器，“十一月七日，开元寺僧贞顺私以破釜卖与商人，现有十斤，其商人得铁出去，于寺门里逢巡检人，被勘捉归来。巡检五人来云：‘近者相公断铁，不令卖买，何辄卖与？’贞顺答云：‘未知有断，卖与。’即勾当并贞顺具状，请处分，官中免却。自知扬州管内不许卖买铁矣。”

文化上，记载了他们市井购买王维的文章，“十一月二日，买维摩关中疏四卷，价四百五十文。”时令方面，记载了节气，如“廿六日夜，人咸不睡，与本国正月庚申之夜同也。”“廿七日，冬至之节，道俗各致礼贺。在俗者拜官，贺冬至节。”

#### 记载路途上的艰辛

鉴真第四次东渡到永嘉（今浙江温州）时，其弟子灵祐试图阻止鉴真东渡，联合诸寺三纲众僧牒告于州县，官府官吏“寻踪至禅林寺，捉得大和上”差使押送大和上鉴真一行返回扬州。文中记载：“诸州道俗闻和上还至，各办四事供养，竞来庆贺，递相握手慰劳。独和上忧愁，呵责灵祐，不赐开颜。其灵祐日日忏悔，乞欢喜，每夜一立至五更谢罪。遂终六十日，又诸寺三纲、大德共来礼谢，乞欢喜，和上乃开颜耳。”这一段记载，表现了鉴真和上在中国东南扬州一带的威望和影响，深受禅林的仰慕，拱卫为佛门的领袖。同时又说明鉴真法师东渡日本传法的决心坚不可摧。

鉴真第一次东渡时，弟子中有高丽僧如海品行不端，决定不带如海随行。如海便到官府采访厅诬告大和上鉴真一行，说：“大使知否？有僧道航造舟入海，与海贼连。都有若干人，



已办干粮，在既济、开元、大明寺，复有百海贼入城来。”时淮南道采访使班景倩闻即大骇，便令人将如海于狱中推问；又差官人于诸寺收捉贼徒。这一段记载反映了唐朝官府对于海外的交流政策持谨慎小心的态度，也说明有高丽人在唐朝学习佛学。

《东征传》含有纪事本末体的内涵，记载鉴真法师的活动的每一件事情大多比较完整，本末脉络清晰。第五次东渡日本，海上遇到风暴，船只被漂向唐朝南疆海南，途中缺水，其记载显示了东渡的艰辛。择引一段记载的文字如下：

其后二日无物，唯有疾风高浪。众僧恼卧，但普照师每日食时，行生米少许，与众僧以充中食。舟上无水，嚼米，喉干咽不入，吐不出；饮咸水，腹即涨。一生辛苦，何剧于此。海中忽有四只金鱼，长各一尺许，走绕舟四边。明旦，风息，见山。人总渴水，临欲死；荣叡（rui,同睿）师面色忽然怡悦，即说云：“梦见有官人请我受戒忏悔，睿曰：‘贫道甚渴，欲得水’；彼官人取水与睿，水色如乳汁，取饮甚美，心既清凉，睿语彼官人曰：‘舟上三十余人，多日不饮水，甚大饥渴，请檀越早取水来。’时彼官人唤雨令老人处分，云汝等大了事人，急送水来。梦相如是，水应今至，诸人急须把碗待。”众人闻此总欢喜。明日，未时，西南空中云起来，覆舟上，注鱼；人人把碗承水饮。第二日亦雨，至人皆饱足。明日近岸，有四白鱼来，引舟至泊舟浦。舟人把碗，竞上岸头觅水，过一小岗，便遇池水，清凉甘美，众人争饮，各得饱满。

这一段记载，反映了海上缺水的困难。船上三十余人面对饥渴的困苦，以说梦的方式相互精神鼓励；接雨水维持生命；善于利用海洋生物—金鱼、白鱼等游踪，寻找海岸，寻找水源。在长期的航海中，食品不足，每天只能够进餐“生米少许”。所有这些，刻画了鉴真一行多么艰苦，何等坚强！

第五次东渡，有一段记载海难崖州的情况：“彼处珍异口味，乃有益智子、槟榔子、……甘甜于蜜，花如七宝色；瞻唐香树，聚生成林，风至，香闻五里之外；又有菠萝捺（nà）树，果大如冬瓜，树似檳榔；毕钵果，子同今见，叶似水葱；其根味似干柿。十月作田，五月收粟；养蚕八度，收稻再度。男着木笠，女着布絮。人皆雕踢凿齿，绣面鼻饮，是其异也。”对于中国海南岛的物产、人情、农业、养蚕业等等都进行了细致的记载。很有价值。鉴真法师从广州返回扬州的途中，其弟子祥彦病死的情形也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次至吉州，僧祥彦于舟上端坐，问思讷师云：‘大和上睡觉否？’思讷答曰：‘睡未起。’彦云：‘今欲死别。’思讷咨和上，和上烧香，将曲几来，使彦凭几向西方念阿弥陀佛。彦即一声唱佛，端坐，寂然无言。和上乃唤：‘彦！彦！’悲恸无数。”这一段记载，反映了中国僧侣不畏死难，为传播文化不屈不挠的坚强信念。

《东征传》吸收了中国史书夹叙夹议的传统方法，第六次东渡日本有一段记载：“大和上从天宝二载始为传戒，五度装束，渡海艰辛，虽被漂回，本愿不退，至第六度，过日本三十六人，总无常去退心。道俗二百余人，唯有大和上、学问僧普照、天台僧思讷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遂果本愿，来传圣戒；方知济物慈悲，宿因深厚，不惜身命，所度极多。”

第四次东渡中有一段记载：“明日，斋后踰（yú,同“逾”）山，岭峻途远，日暮夜暗，涧

水没膝，飞雪弥眼，诸人泣泪，同受寒苦。明日度岭，入始丰县，日暮到国清寺，松篁蓊郁，奇树璀璨；宝塔玉殿，玲珑赫奕，庄严华饰，不可言尽。孙绰《天台山赋》不能尽其万一。”这一段记载，不仅时间地点清楚，途中的艰险和疲惫全部在短短的数行字句中凸现。对于始丰县国清寺的挥毫泼墨的记载，除了反映佛教的历史以外，也含蓄了这批文化苦旅征服困难之后的喜悦，并且借用了南朝学者孙绰的《天台山赋》加以概括。

### 史料价值

唐代中日关系的历史记载不多，《入唐记》涉及范围广，记载的时间长，书中记载的正是武宗会昌灭佛的时期，这部史书，不仅记载了唐代中日两国海上陆上的交通情况、风俗仪式、典章制度、地方组织、政治措施、以及宗教、外交等方面的情况，最重要的是作者撰写的内容都是亲身经历，随笔记录书中收录了当时往返的书简、牒文，实为考证中唐以后公私文牍、格式、手续的重要史料。日本古代历任中国的外交官、留学生、学问僧等等，人数不少，但是有记录的不多。为数有限的几部现存史料：唐代圆珍《行历钞》/宋朝成寻阿闍（dū，泛指台）梨《参天台五台山记》/明代释氏瑞訢《入唐记》/明代释氏策彦《初渡集》、《再渡集》

《入唐记》卷四会昌五年四月：“左右神策军者，天子护军也。每年有十万军，自古君王频有臣叛之乱，乃置此军已来，无人敢夺国位。敕赐印每中尉初上时，准敕出兵马迎印。别行公事，不属南司。今年四月初，有敕索两军印，中尉不肯纳印；有敕再三索，敕意索护军印。附中书门下，令掌相管两军事，一切拟令取相处分也。左军中尉即许纳印，而右军中尉不肯纳印，遂奏云，迎印之日，出兵马迎之，纳印之日，亦须动兵马纳也。中尉意，敕若许，即因此便动兵马起异事也。便仰所司，暗排比兵马，人君怕，且纵不索。”

这一段历史记载，反映了唐武宗与宦官政治势力之间较量。武宗试图收回神策军的军印，夺回兵权，而右军中尉（按：鱼弘志）阴谋兵变，武宗莫之奈何，“且纵不索”。《新唐书·仇士良传》记载了这件事情，云：“武宗明断，虽有仇士良援立之功，内实嫌之，阳示尊宠。”对比之下，可以看到《入唐记》的记载准确，眼光敏锐。

关于会昌灭佛大记载，我历史典籍上记载的内容简略不详，而《入唐记》则有详细的记载，弥补了这一薄弱地方。下面摘录几段代表性的文字：

（会昌元年）六月十一日，今上降诞日，于内里设斋，两街供养大德及道士集谈经，四对议论，二道士赐紫，释门大德总不得着。南天竺三藏宝月入内对君王，从自怀中拔出表进请归本国；不先咨开府，恶发，五日军内收禁犯越官罪，故宝月弟子三人各决七棒，通事僧决十棒。不打三藏，不放归国。

（会昌二年）三月三日，李宰相闻奏僧尼条流，敕下发遣保外，无名僧不许置童子、沙弥。十月九日，敕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功，曾犯淫、养妻，不修行者，并勒还俗。若僧尼有钱物及谷斗、田地、庄园，收纳官。如惜钱财，情愿还俗去，亦任勒还俗，充入两税徭役。”敕文在别。城中两街功德使帖诸寺，不放出僧尼，长闭寺门。僧眩玄奏：“自作剑轮，自领兵打回鹘国。”敕令彼僧试作剑轮，不

成。又准宰相李绅闻奏，因起此条疏。其僧眩玄，当盗。赦罪。准敕斩首讫。

左右街功德使帖诸寺，勘隶僧尼财物。准敕条疏天下。大同诸州府、中书门下牒行。京城内仇军容拒敕，不欲条疏，缘敕意不许，且许请权停一百日内帖诸寺，不放僧尼出寺。左街功德使奏，准敕条疏僧尼，除年已衰老及戒行精确外，爱惜资财，自还俗僧尼共一千二百卅二人。右街功德使奏，准敕条流僧尼，除年已衰老及戒行精确外，爱惜资财，自还俗僧尼共二千二百五十九人。奉敕“左、右街功德使奏，准去年十月七日、十六日敕，条疏令还俗僧尼，宜依其爱惜资财，情愿还俗者，各委本贯收充两税户。向后诸道有如此色类，并准此处分。所蓄奴婢，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婢二人，余各任本家收管。如无家者，官为货卖。同衣钵余外资财收贮，待后敕处分。其僧尼所留奴婢，如有武艺及解诸药、诸术等，并不得留，不得削发私度。如有违犯，纲维知事录报官。余资产钱物等，各委功德使自条疏闻奏。”

（会昌三年）二月一日，使牒云：僧尼已还俗者，辄不得入寺及停止。又发遣保外僧尼，不许往京入镇内。

以上敕令、条疏客观地记载了武宗废佛的具体政策和实施。

《入唐记》卷四记载：（会昌三年六月）十一日，今上德阳日，内里设斋，两街大德及道士御前论义。每街停止十二员大德，功德使帖巡院，令简择大德，每街各七人，依旧例入内。大德对道士论义，道士二人敕赐紫衣，而大德惣不得着紫。又德阳日前十五日，内宫内诸司各赴诸寺，设斋献寿。太子詹事韦宗卿撰涅槃经疏廿卷进。今上览已，焚烧经疏。敕中书门下，令就宅追索草本烧焚。其敕文如左：

敕：“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詹事、上柱国、花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韦宗卿，忝列崇班，合遵儒业；溺于邪说，是扇妖风。既开眩惑之端，全戾典坟之旨，簪纓之内，颓靡何深！况非圣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传。虽欲色容，恐伤风俗。宜从左官，犹谓宽恩。可任成都府尹，驰驿发遣。太子詹事宗卿进佛教涅槃经中撰成三德廿卷，奉敕大圆伊字镜略廿卷，具已详览。佛本西戎之人，教张不生之说；孔乃中土之圣，经闻利益之言。而韦宗卿素儒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扬孔、墨，翻乃溺信浮屠，妄撰胡书，辄有轻进。况中国黎庶久染此风，诚宜共遏迷聋，使其反朴，而乃集妖妄，转惑愚人。位列朝行，岂宜自愧。其所进经，内中已焚烧讫。其草本，委中书门下追索焚烧，不得传之于外。”

会昌四年岁次甲子，二月，越州军事押衙姓潘，因使进药，将圆载阁梨书来。书云：“缘衣粮罄尽，遣弟子僧仁好等两人往本国，请衣粮去者。”潘押衙云：“载上人欲得入城来，请得越州牒，付余令进中书门下。余近日专候方便，入中书送牒。宰相批破，不许入奏例。上人事不成也。”三月，敕下：“朕欲驾幸东京，仍晓示百寮，如有朝臣谏者，诛身灭族。”敕不许供养佛牙。又敕下云：“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寺中有佛指节也。并不许置供及巡礼等，如有人送一钱者，脊杖二十。如有僧尼等，在前件处受一钱者，脊杖二十。诸道州县应有送供人者，当处投获，脊杖二十。”因此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准敕勘责彼处僧人，无公验者，并当处打(煞-口)，具姓名闻奏。恐潞府留后押衙作僧，潜在彼处也。宰相李绅、李德裕奏停三长月，作道士教新定三日月：正

月上元、六月中元、十月下元。唐国恒式，三长月不许(煞-口)命。今上则不然也。为破游府，敕召道士八十一人，又于内里，令作九天道场。于露处，高垒八十张床，铺设精彩，十二时行道祭天尊，乾脯酒肉，用祭大罗天。四月一日起首，直到七月十五日为终期。其道场不在屋舍内，于露庭中作法。清明即日灸，雨下即霖身，八十一人中，多有着病者也。今上偏信道教，憎嫉佛法，不喜见僧，不欲闻三宝。长生殿内道场，自古已来，安置佛像经教。抽两街诸寺解持念僧三七人，番次差入，每日持念，日夜不绝。今上便令焚烧经教，毁拆佛像，起出僧众，各归本寺。于道场安置天尊老君之像，令道士转道经，修练道术。国风，每年至皇帝降诞日，请两街供奉讲论大德及道士，于内里设斋行香，请僧谈经，对释教道教对论义。今年只请道士，不请僧也。看其体色，从今已后，不要僧人入内。道士奏云：“孔子说云：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臣等窃惟黑衣者，是僧人也。”皇帝受其言，因此憎嫌僧尼。意云，“李”字十八子。为今上当第十八代，恐李家运尽，便有黑衣夺位欵。功德使帖诸寺，准敕不许僧尼街里行犯钟声。若有出者，事须诸寺钟声未动已前，各归本讫；又不许别寺宿。若有僧尼街里行犯钟声，及向别寺宿经一夜者，科违敕罪。从前不许午后出寺，今不许犯钟声。二月，驾幸右街金仙观，是女观。观中有女道士，甚有容。天子召见入意，敕赐绢一千疋。遂宣中官令修造观，便通内，特造金仙楼。其观本来破落，令修造严丽，天子频驾幸。向后驾幸左街兴唐观，是道士观，又赐千疋。特令修造铜铸圣容，作圣容当庄严奇绝。

(会昌五年四月)见说功德使条疏僧尼还俗之事，商议次第，且令卅已下还俗讫，次令五十已下还俗，次令五十已上、无祠部牒者还俗。第三番令祠部牒磨勘，差殊者还俗。最后有祠部牒不差谬者，尽令还俗，即僧尼绝也。斯之商议，天下大同也。

缘准敕行，故从四月一日起首，年卅已下僧尼还俗，递归本贯。每日三百僧还俗，十五日，年卅已下僧尼方尽。从十六日起首，五十已下僧尼还俗，直到五月十日方尽也。十一日起首，五十已上无祠部牒者还俗。前年已来，牒疏僧尼，即简粗行不依本教者，还俗，递归本贯。今年不简高行粗行，不论验僧、大德、内供奉也。但到次第，便令还俗。

频有敕问，已还俗者多少，未还俗者多少，催进其数。外国僧未入条疏之例，功德使别闻奏取裁。有敕云：“外国僧若无祠部牒者，亦勒还俗，递归本国者。”西国北天竺三藏难陀，在大兴善寺；南天竺三藏宝月兼弟子四人，于中天成业，并解持念大法、律行精细、博解经论，在青龙寺，并无唐国祠部牒。

新罗国僧亦无祠部牒者多。日本国僧圆仁、惟正亦无唐国祠部牒。功德使准敕，配入还俗例。又帖诸寺牒云：“如有僧尼不伏还俗者，科违敕罪，当时决(煞-口)者。”闻此事，装束文书，所写经论、持念教法、曼荼罗等装裹讫。文书兼衣服都有四笼，便买三头驴，待处分来。心不忧还俗，只忧所写圣教不得随身将行。又敕切断佛教，恐在路诸州府检勘得实，科违敕之罪。

(会昌五年八月)近有敕，天下还俗僧尼缁服，各仰本州县尽收焚烧。恐衣冠亲播，持势隐在私家，窃披缁服。事须切加收检，尽皆焚烧讫，闻奏。如焚烧已后，有僧尼将缁服不通

出，巡檢之時，有此色者，准敕处分者。

諸州縣准敕牒諸坊諸鄉，收僧尼衣服，將到州縣盡焚燒。又有敕令天下寺舍，奇異寶佩、珠玉金銀，仰本州縣收檢進上。又有敕云：“天下寺舍僧尼所用銅器、鐘磬、釜鎗等，委諸道鹽鐵使收入官庫，且錄聞奏者。”

以上摘錄可以略見武宗毀寺滅佛的概貌，從朝廷的政策、到社會上的實施，對於本國僧尼逐步還俗的措施，以及外國僧尼的政策，都十分清晰明朗。《入唐記》的作者圓仁，名單不在祠部造冊的名單之列，因此也被列入還俗的名單。圓仁不得已，蓄髮更換緇衣，才離開天台回到海州，等待歸國。

#### 参考資料

《三代實錄》卷 8，《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 3，《元亨釋書》卷 3，《日本高僧傳》卷 6，《華芳余輝》

#### 摘 要

唐代の日本僧である元開と円仁は、中国と日本の仏教文化史に関する二つの歴史書を著した。前者は『唐大和上東征伝』であり、後者は『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である。この両著作は新旧唐書の芸文志、経籍志には著録されていないが、その史料価値と学術的価値において一定の意義があり、中国域外文化史の双璧と言える。唐代史および中国内外文化史を研究する者は、おろそかにしてはならない史料である。この二つの書物は体裁や記載内容に違いがあり、そこに書かれた人物にもそれぞれ特色がある。しかし共通する面も多く、どちらも作者は日本人で、しかもそれらは漢文を使って書いた漢籍で、同時代の人間が同時代史を書いた歴史書であり、中日文化交流の題材を記したという点にある。本論では歴史学の理論と方法を用いてこの二つの書物を比較し、その史学的価値を考察する。

『唐大和上東征伝』一卷、約一万言（以下『東征伝』と略称）、作者は日本の真人開元であり、鑑真が日本に渡った経緯と一生を紀伝体の形式によって記している。この書物の主要な版本は日本で流伝し、おおよそ宋代になって中国に入ってきた。賛寧『宋高僧伝』にもこの『東征伝』が著録されている。一方、『入唐求法巡礼行記』四巻、約八万五千字（以下『入唐記』と略称）、作者は日本の著名な高僧円仁であり、彼が唐朝に遊学した十年間が記録されている。これはもとは日記であり、のちに編年体の形式にして書物ができあがった。『入唐記』は中国の伝統的な史法を体得している。編年体には補叙、挿叙、追叙があり、これによって『入唐記』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の任務を完成している。『東征伝』は伝記の体裁であるが、人物の行動は編年の順序に合致し、深く中国紀伝体の法を体得している。この二冊が記載する時代は唐の玄宗から武宗までであり、この間は中国の仏教政策が激変した時期である。中国に留学し、訪問した僧侶もこの政策の影響を受けており、二つの史書は当時の貴重な史料を残している。

『東征伝』には鑑真が五度日本に渡ろうとして失敗し、最後の六度目でやっと成功した経緯が記されている。『入唐記』では円仁が入唐した際に、自然条件や社会条件の制約を受けながら、やっと入唐の目的を果たしたことが記されている。また鑑真は弟子の栄叡と祥彦を旅の途中で亡くし、彼自身も日本で亡くなっている。円仁の学生惟暁も帰国の前に五台山で亡くなっており、この文化交流に殉じた日本僧の遺骨は中国にある。さらに鑑真は日本の建築技術、彫塑芸術の発展を促進し、書法、刺繍、薬学などの点でも広く交流があった。『入唐記』には唐朝の皇室と宦官、士大夫の間の政治矛盾や、節句、祭祀、飲食、禁忌などの社会生活、地方の人口や産物、物価、水陸交通、駅館、新羅商人の状況などが広範囲に記されている。

この二つの書物には苦難の旅の様子とともに、中日両国の社会発展や政治、経済、軍事、風俗民情などの豊富な内容が記載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はこの時期の文化活動を深く知る上で本質的な社会的背景を提示するとともに、その他各方面の学術研究にも貴重な史料を提供している。円仁については、上記のほか寺院の儀式や武宗期の廃仏、僧侶の待遇などが記されており、これらは唐代史研究の第一次資料である。また鑑真については、彼らが日本に携帯した文献や物品、知識や技術を持った人材などがあり、さらには海上航行の状況や両国各地の町や仏寺、通過した地域の社会、政治、経済、民情が記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はすべて中日文化交流の貴重な証拠である。

平成18年 (2006) 11月30日受理

平成19年 (2007) 1月11日採択